

# 试论西方古典修辞术的政治特质

林志雄

(嘉应学院社科部, 广东梅州, 514015)

**摘要:** 修辞术是西方的一门古老学问, 而且是西方文化传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我们谈到西方修辞术时, 常常将之拿来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汉语修辞学相比较思考。实际上, 如果不先深入认识西方修辞术的种种特质的话, 任何轻易的比附只会带来模糊和混淆。回到西方修辞术的历史传统, 我们发现政治性是其最本质的特质。只有认识了西方修辞术与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 我们才可能真正认识西方修辞术。本文考察了西方古典修辞术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的重要历史演变, 试图理清西方古典修辞术与社会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 并由此还原西方古典修辞术本质上的政治特质。

**关键词:** 修辞术; 西方古典修辞术; 政治特质; 雅典民主制; 罗马共和制

**中图分类号:** B5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5-0609-07

传统中, 修辞术(rhetoric)<sup>①</sup>是一门与哲学几乎同样古老的学问。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修辞术的学习成为政治人受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修辞术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吸引了大批有着睿智头脑的人投身于研究和传授工作。然而, 随着西方社会政治的嬗变, 与政治有着直接关联的修辞术也遭遇了盛衰起伏的坎坷命运。特别是从启蒙运动开始, 随着理性科学主导地位的逐渐确立, 曾经作为一门政治技艺而备受推崇的修辞术也慢慢完成了向学科化的“修辞学”的蜕变, 成为少数理论爱好者在学院中把玩的对象, 并与语言学和文学的关系愈加密切。在今天的西方, 当人们听到“修辞”一词时, 头脑里容易联想到的, 或是政客们的种种欺骗手腕, 或是词藻华丽但空洞无物的陈词滥调, 甚至是颠倒是非、撒谎骗人的花言巧语, 甚至越来越多的人抱怨修辞学让人们彼此难于清楚坦诚地进行交流<sup>[1][4]</sup>。然而另一方面, 政治演讲与论辩, 以及其他以修辞的名目出现的行为, 则依旧活跃于政治生活、社交活动、传媒广播等各个角落。那么, 修辞术到底是什么呢? 到底应该如何认识当今修辞行为日益活跃的现象? 到底应该如何认识修辞学与现代政治社会的种种密切关系? 若要全面认识和解答这些问题, 除了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出直接研究和解释外, 似乎还需要另一个参照系, 才能给出清晰的启示和答案。这个参照系就是现代修辞学的前身——古

典修辞术, 以及古典修辞术曾经遇到的境遇。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古典修辞术在雅典民主制和罗马共和制中的历史演变, 还原西方古典修辞术的本有的政治特质, 在揭示古典修辞术与古代社会政治的交错关系的同时, 为我们认识现代西方修辞学的境况提供一个“以史为鉴”的坐标系。

## 一

在西方, 古典修辞术(classical rhetoric), 通常指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修辞术<sup>[2][3]</sup>。要认识西方古典修辞术, 我们首先还得从古今修辞观念的差异说起。对于西方古今修辞观念的演变, 尼采有段非常深刻的洞见:

修辞观念的独特演变, 从属于古代和现代之间的特别差异: 在近代, 这门艺术处于声名狼藉的境地, 即便在其使用时, 最多也不过是被我们现代人视作浅薄涉猎的对象和拙劣的经验论。通常认为, 与之比较而言, 对本质上何谓真(true)的感知方面, 发展更大: 修辞术只在一个仍旧生活在神话想象之中的人群中发生, 这些人仍旧尚未感受到对历史准确性的绝对需要, 他们仍旧宁愿被说服, 而不是被指示。另外, 对公开论辩人才的需求, 想必曾经促成了这门自由艺术的发展。因而可以说, 修辞术本质上是一门共和政体的

收稿日期: 2008-05-04

作者简介: 林志雄(1977-), 男, 广东梅州人, 广东嘉应学院社科部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西方政治哲学。

(republican)的艺术:这一政体中的人们必须习惯于容忍最为与众不同的意见和观点,甚至在反驳抗辩中得到某种快乐;人人都乐于洗耳恭听,正如人人都乐于滔滔不绝;而且作为听众的人,必须或多或少能够欣赏演说者所运用的这门艺术。古人的教育通常以修辞术为顶点:它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人的最高的精神活动,——这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不可思议!<sup>②[3](3)</sup>

尼采的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西方古典修辞术,至少给出了三点启示:首先,修辞术在古代和现代有着极为不同的境遇,由于受到近代社会政治演变以及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影响,作为一门学科的修辞术逐渐失去了往日无比崇高的地位。其次,要认识古代修辞术的本质和境遇,就必须从其政治特质入手,结合古典修辞术与古代社会政治体制的关系,以及在社会生活的作用来加以考察。再次,古典修辞术在政治活动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这在根本上源于修辞术作为古代教育的一门重要学科所受到的重视。

尼采的启示固然极为令人回味,对于熟悉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人来说应该也不难理解,然而,对于刚刚起步着手深入认识西方修辞传统的我们来说,内心还是会问:到底什么是修辞术?

“修辞术”一词是我们对古希腊语 ρήτορικῆς的汉译,基本意思是“演说的艺术”<sup>[4](19)</sup>。据西方学者考证,ρήτορικῆς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对话《高尔吉亚》中,而这篇对话约写于公元前4世纪二十年代<sup>[5](3)</sup>。对话中,当苏格拉底用 ρήτορικῆς指称一门公共演讲的技艺(τέχνη)时,智术师高尔吉亚及其追随者波鲁斯(Polus)似乎接受了苏格拉底的说法。高尔吉亚还自称熟练掌握这门技艺,并向别人传授,而波鲁斯则专门写过这方面的著作。事实上,ρήτορικῆς在其它公元前5世纪流传下来的古希腊文本中均不曾出现,甚至将时间往后推至公元前4世纪,这个词也几乎仅见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之间,对言谈说话技艺的指称,更加常用的是 τέχνη λόγων,直译即“关于逻各斯的技艺”。这里的逻各斯意为语言或言辞,因此 τέχνη λόγων可译为“言说术”。而首次出现于柏拉图对话的 ρήτορικῆς一词源于 ρήτωρ(speaker,雄辩者),通常暗含政治家的意思。据此,西方有学者认为,希腊单词 ρήτορικῆς是柏拉图创造出来的,并加入了特定的内涵——强调政治言说技艺(political rhetoric)<sup>[6][40-41]</sup>。也就是说,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作为研究如何在公共演说中把话说好的一门学问,修辞术(ρήτορικῆς)包含在言说术<sup>③</sup>(λόγων τέχνη)范围之内。

由此可见,公元前5世纪的智术师们所研究的语

言、言说和推理的技艺,其范围实际上包括了除政治言说之外更加广泛的言说方式(forms of discourse)。当时普遍被人们称为言说术的学问,在外延上要比柏拉图所界定的修辞术宽泛得多,而且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并没有受到过于严厉的苛责和批判。这一点,在研究“智者学派”的西方学者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sup>[6]</sup>。在《高尔吉亚》中,我们发现柏拉图用修辞术(ρήτορικῆς)来专门指称政治言说技艺,并借苏格拉底之口将之定义为“说服的制造者”<sup>[7](453a2)</sup> πειθοῦς δημιουργός,与烹调术一样并不拥有真正的知识,因而不能算真正的技艺<sup>[7](464b1-466a6)</sup>。

事实上,柏拉图将修辞术专门指智术师们教授的在公共政治活动中进行说服的技艺。具体来说,说服的技艺除了关于长篇大论的演说技艺之外,还包括对立两派互相争辩的技艺,即辩论术(ἡ ἀντιλογικῆ)<sup>[8](261a-e)</sup>,主要使用场合是政治集会和法庭诉讼。与此相比较,在柏拉图看来,把话说好的学问绝非仅仅修辞术一门,至少辩证术(τέχνη διαλεκτική)<sup>④</sup>作为言说的学问比起修辞术来要高明得多,而后者仅为苏格拉底这样的哲人为追求真理而使用,并用于教育引导极少数拥有高贵灵魂且希望追求真理和智慧的人。虽然在柏拉图的伟大对话录中,我们不时看到智术师中的修辞家在哲人苏格拉底面前词穷理屈的窘态、以及狼狈不堪的身影,但修辞术本身却并没有因屡屡遭受哲人的攻击而立刻式微,反而是在哲学的批评声中接受洗礼和滋养,并顽强而旺盛地茁壮成长。其中原因到底何在呢?要找到答案,还得暂时放下柏拉图的书卷,回到雅典的社会政治土壤中去寻找。

## 二

在人类社会政治活动中,有两大直接动因推动着人类群体性政治行为的展开以及政治理想的落实,其一是言辞说服,其二是暴力征服。翻开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或希罗多德的《历史》,抑或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们可以看到,无论这些大书在记述人类政治活动的细节方面显得多么的纷纭复杂,然而背后的直接手段却都可归结为言辞说服和暴力征服。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似乎就开始了在这两项选择中艰难抉择的历程。在哲学家眼里,暴力虽无法彻底摆脱,但言辞说服似乎是一种更加合乎人类文明的方式,甚至是人类优于动物的独特本领。修辞术作为与言语相关的技艺,其存在的合理性首先就根源于人类作为政治动物的本性,以及人类天生具

备的独特的言语能力。亚里士多德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作为动物而论，人类为什么比蜂类或其它群居动物所结合的团体达到更高的政治组织，原因也是明显的。照我们的理论，自然不造无用的事物；而在各种动物中，独有具备言语的机能。声音可以表白悲欢，一般动物都具有发声的机能：它们凭这种机能可将各自的哀乐互相传达。至于一事物的是否有利(τὸ συμφέρον)或有害(τὸ βλαβερόν)，以及事物的是否合乎正义(τὸ δίκαιον)或不合正义(τὸ ἄδίκον)，这就得凭借言语(λόγος)来为之说明。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它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之互相传达)，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sup>[9](8)</sup>

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政治哲人们逐渐认识到，言语的重要性绝不仅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交流，更重要的是，通过言语的力量，“能够或者把散居的人们聚集到一处，或者使他们由野蛮的、未开化的生活进入这种合乎人性的、市民社会的生活，或者为新形成的居民共同体制定法律，设立法庭，规定法权”<sup>[10](23)</sup>。也就是说，人类合群而居的政治天性，需要通过人类言语能力的发挥来实现。而在实现统一的生产活动以及调解政治和法律的纷争中，言辞的说服力量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在西方古代社会，政治性说服的主要方式是公开演说和辩论。从荷马史诗的描述可以清楚看到，早在英雄时代，包括演说和辩论在内的政治性说服就已经在政治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伊利亚特》第二卷开头，当宙斯要向英雄阿伽门农传话时，便派去了梦幻之神，而梦幻之神则又化成了涅斯托尔(Nestor)的形象出现在阿伽门农的梦境中对其进行劝服工作<sup>[11](14)</sup>。在史诗中，这位奈斯托耳不仅表现得足智多谋，而且口才出众，特别善于言辞，堪称英雄阿伽门农的修辞术导师。除此之外，荷马史诗中的精彩演说和辩论，无不隐隐暗示希腊古风时期修辞术教育的存在。然而，由于文本资料的限制，从史诗类文本中，我们无从看到直接具体的修辞术传授活动，以及详细的修辞术理论，因此，在西方修辞传统的研究中，严格意义上作为一门技艺来传授的修辞术还要从这之后晚许多年的时间算起。

西方当代的修辞学史家根据古代作家的记述，通常把古典修辞术诞生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sup>[12](26)</sup>。确凿的缘起便是西塞罗亚里士多德观点转述，即认为公元前5世纪的西西里(Sicily)叙拉古人科拉克斯(Corax)和提西阿斯(Tisias)是修辞术的发明者和奠基人<sup>[10](91)</sup>。从

亚里士多德对修辞术(ρήτορική)一词的使用看，亚里士多德不仅在修辞术的界定上，而且在修辞术发展史的叙述上，均受到老师柏拉图的深刻影响<sup>⑤</sup>。西方修辞学史著作的通常记述是，公元前5世纪间，由于西西里人无法忍受暴政，便驱逐了那位残暴的独裁者，于是，民众开始通过司法程序重新收回被侵占私有的财产。因涉及的财物和人数纷纭复杂，人们苦于无法在法庭上清楚申明自己的权利，这时候叙拉古人科拉克斯和提西阿斯站出来，将一些法庭演说的相关技巧归纳成理论规则，以便人们易于学习掌握，从此便正式开启了修辞术研究和学习的历史。从这段有关修辞术起源的记述，我们得知，其实最早的修辞术是关于法庭演说(judicial rhetoric)的技艺，也就是说，修辞术从诞生之日起便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经过深入挖掘和研究，修辞学史家们发现，虽然远在荷马史诗描述的世界里，就已有修辞术教育的迹象，但雅典民主政治才是催生古典修辞术破土而出的肥沃土壤。随着民主制在雅典的逐步建立和发展，无论在法庭、议事会，还是在民众大会，挥洒自如而且机智雄辩的口头和书面表达成为民主政治这台大机器顺利运转的“润滑剂”，学习和掌握公共演说技巧成为民众有效参与公共辩论及政治决策的必要条件。总结和传授公共演说和公开论辩技艺的修辞术逐渐成为民主政治的婢女(handmaiden)。对此，西方学者布里说得好：

希腊民主城邦的宪政决定了普通公民有在公共场合发言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任何一个对政治有抱负的人都是必不可少的。当一个人被他的敌人拖上法庭，而他又不知道说些什么时，那就无异于一个赤手空拳的人被一群士兵攻击。清晰地表达观点的能力，以及运用这种能力去说服听众是一种艺术，需要学习和经过传授才能获得。但仅仅掌握词汇还不够，还要学会如何辩论，并在政治和伦理问题的讨论中锻炼自己。这就要求有一种较高层次的教育。<sup>[13](8-19)</sup>

在雅典，很快出现了三种与修辞术有关的活动：首先，有不少人称“智者”的专业知识分子开始建立修辞术学校，专门向前来就学的学生教授有效说服；其次，出现一批专门为法庭上的诉讼人代写演说辞的“辩辞写手”(logographers)；最后，还出现一群职业演说家，专门穿梭于各个城邦之间，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发表哲学式的演讲(philosophical discourses)<sup>[14](24)</sup>。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修辞术作为政治人受教育的重要部分，便逐渐蓬勃发展起来。

## 三

随着民主政治走向成熟,修辞术在智术师的手里得到了飞速的传播和发展,但同时也受到了种种批评和质疑。对修辞术进行审视和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修辞术的传授者智术师。一方面,无论智术师通过言教和身教将演说技巧和辩论技巧传授得多么成功,他们似乎从来无意关心学习者的道德品质上的修养,特别是忽视了维护正义的考量,这种不负责任的忽视,引来了戏剧家的严厉讽刺以及哲学家的猛烈批评<sup>①[15]</sup>。另一方面,从智术师的实践活动着手考虑,可以看到智术师运动的总的特点就是传授演说和论辩的技艺,用柏拉图的话说智术师只是传授 *techné*(技艺)而不是 *epistémē*(知识)。

就柏拉图的批评而言,大致可以理出两方面的意图。首先是政治道德方面的考量。在柏拉图看来,智术师派的修辞家们传授的修辞术到了道德品质不端正的人手里,极有可能变成害人的利器:第一,在民主制下,少数居心不良者可能利用修辞术为自己谋取专制权力服务,成为煽动家和蛊惑家,加速民主制向僭主制的堕落。第二,修辞术可能被用于法庭上为恶人辩护,控告好人,颠倒是非,妖言惑众,成为政治腐败的根源。第三,修辞术指导演说者通过快乐来满足民众的欲望,在奉承和取悦民众来达到说服的目的,势必助长民众的享乐和纵欲之风,最终造成社会的混乱和颓败<sup>[7]</sup>。如果我们翻开希腊历史就可以看到,雅典帝国的衰亡似乎印证了哲人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其次是出于站在哲学的立场上为哲人生活方式辩护的考量。在柏拉图看来,以说服为目的的修辞术与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哲学在价值趋向上是严格对立的。一方面,修辞术为了实现在政治中说服的目的,势必要以取悦民众,满足民众的欲望为手段。然而,站在哲学的角度看,真理并不一定掌握在民众手中,取悦民众势必脱离对真理的坚持。正义并不在于获得多数人的同意,正义应该源自对自然的认识,实现正义势必要用理性来发扬节制的德性,控制而非放纵欲望;第三,选择高尚的生活,根本在于天性和秉赋,高尚生活中蕴涵的智慧只能通过教导在少数人中得到传承,而非拿到大众面前去宣讲和说服。另一方面,巧言令色的修辞家容易联合民众,与哲人形成水火不容的对立之势,甚至直接威胁到哲人的生命。在柏拉图写作的对话《申辩》中,我们从控告苏格拉底的代表中,便发现了修辞家的身影<sup>②[16]</sup>。

虽然智术师的修辞术受到了柏拉图的严厉攻击,但修辞术本身却并未因此丧失存在的合理性,这一点在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修正。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修辞术》的开篇便为修辞术提出了著名的辩护,而且一上来便将修辞术提高到与辩证术同等重要的高度,并肯定修辞术可以作为一门知识性学科,他写道:

修辞术是辩证术的对应物,因为二者都论证那种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都能认识的事理,而且都不属于任何一种科学。人人都使用这两种艺术,因为人人都企图批评一个论点或者支持一个论点,为自己辩护或者控告人。大多数人,有一些是随随便便地这样做,有一些是凭习惯养成的熟练技能这样作。既然这两种办法都可能成功,那么,很明显,我们可以从中找出一些法则来,因为我们可以研究为什么有些人是凭熟练技能而成功的,有些人却是碰运气而成功的。人人都承认这种研究是艺术的功能。<sup>③[4](19)</sup>

针对老师柏拉图对修辞术有害性的批评和攻击,亚里士多德同样给出了明确的答辞:

修辞术是有用的。真理和正义自然比它们的对立面强一些,所以,如果判决不当,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失败负责,受到责备。当我们面对广大听众的时候,我们的或然式证明和论证必须建立在普通的语言上。正如在逻辑的论证中一样,在演说中,演说者应当能从两方面论证,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从两方面去说服人(因为我们不应当劝人做坏事),而是说,这样论证,事情的真相才不至于被我们疏忽,而且,在别人不正当地使用论证时,我们便能把他驳倒。在各种艺术中,惟有论辩术从两方面论证。说一个人不能用体力来保护自己是可耻的,不能用演说来保护自己则没有什么可耻,这个说法是可笑的。如果说不正当地使用演说的力量可以害人不浅,那么,除了美德之外,许多好东西,如体力、健康、财富、将才,都应当受到同样的非难;这些东西使用得当,大有好处,使用不得当,大有害处。

修辞术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造成“诡辩者”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的意图。<sup>[4](20)</sup>

从亚里士多德对修辞术有用性的辩护中,我们至少可以读出几点。第一,修辞术应该并且可以为真理和正义服务;第二,修辞术教授的技艺主要用于面对大众,因此必须注意所面对的对象,以此出发来发挥修辞术的功能。第三,就从两面论证问题上,论辩术的方法可以为修辞术所借鉴。第四,修辞术培养的是

人“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的说服能力，至于其使用上的正当与否，则超出了修辞术本身应研究的范围。

当然，亚里士多德在为修辞术辩护的同时，并非对柏拉图的批评意见视而不见，答案就要到《修辞术》之外的其它著作中去寻找了，对此我们将在以后专文论述。重要的是，修辞术终究还是存活了下来。

## 四

如果说，雅典民主政治培育了古典修辞术，并使古典修辞术在理论上逐渐走向成熟的话，那么可以说，到了罗马共和制的环境下，修辞术便开始在实践上走向了巅峰，并随着罗马共和制的衰亡而走向了衰亡。

对修辞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生活中的不同作用和地位，尼采有独到的洞悉。就修辞术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尼采认为，修辞术在崇尚高贵的贵族气质的古罗马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更加显著，特别是从中更充分地突显了个体人所能具有的高贵性：

对于希腊文化生活而言，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把所有智力方面的问题、生活的严肃性问题、必要性问题，乃至危险的问题，统统看作是游戏。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罗马人在修辞术方面属于自然主义者，相对而言较为枯燥和粗糙。但是，罗马政治家的高尚的贵族气质及其从事的各种各样的司法实践为修辞术增色不少。罗马人中的杰出演说家，通常都是强大政治派别的领袖(leaders)，而希腊的演说家则多为私人当事人的利益发言。意识到个体高贵性的是罗马人，而不是希腊人。<sup>[17](5)</sup>

在传入罗马之前，修辞术早已是雅典的土壤上绽放的一朵奇葩：在荷马史诗中得到孕育，在智术师手里获得栽培，在圣哲柏拉图那里接受杀虫锄草，又经亚里士多德得到修剪扶正，最后终于露出了惊艳骄人的身姿。然而，这朵奇葩虽然在理论上已是光芒四射，但只有到了罗马人的手里，才真正在实践中结出了累累硕果。通常认为，在理论思辨上，罗马人要稍逊他们的希腊老师一筹，但到了实践运用上，罗马人却似乎从不缺乏尝试的勇气和推行的魄力。

在罗马人中，在引进和发展修辞术方面做出最杰出贡献的人物，首推西塞罗。作为罗马共和晚期杰出的国务活动家，西塞罗用自己的全部智慧甚至生命将修辞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向了巅峰，堪称理想演说家的典范。从这位最伟大的演说家的笔下，我们读到了罗马人对修辞术无比崇高的礼赞，同时，也清晰

感受到罗马人对修辞术的热情，以及修辞术在罗马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论演说家》中，西塞罗借克拉苏斯之口说道：

我确实认为，没有什么比能用语言掌握人们的智慧，博得人们的好感，把他们的思想引向你所希望的方向，或者把他们从你所希望的方向引开，更美好的了。只有这一种技能在所有自由的人民中间，特别是在和平、宁静的国家里，永远特别发达兴旺，永远处于统治地位。实际上，有什么能够像下述情况如此令人惊异，即从多得无法胜计的人们中间只出现一个人，此人能够或者独自一人，或者同为数很少的人一起，实现自然赋予所有人的秉赋？或者有什么能够像饱含深邃的智慧和崇高的词语，受到过认真琢磨和润色的演说辞那样愉快地作用于人们的思想和听觉？或者有什么能够像一个人的演说征服人们的热情、审判官的犹豫、元老院的坚定那样强大，那样有威力……<sup>[10](23)</sup>

西塞罗不但用语言给予修辞术赞美，而且与其他数目可观的罗马的演说家们用行动发挥着修辞术的威力。在西塞罗数量惊人的传世著作中，不仅留下七部有关修辞学史和修辞术思想的理论著作，而且还留下了在元老院、法庭上、以及公民大会等各类场所发表的演说辞上百篇之多。在西塞罗的一生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政治成就正是其修辞术成功发挥的结果。公元前63年，西塞罗出任罗马执政官，这位雄辩无比的演说家、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用自己的智慧，口才和胆识，领导罗马元老院果断平息了一场险些使罗马共和国遭受覆灭厄运的“喀提林阴谋”，并因此在罗马人民中赢得了“国父”的盛名<sup>[18-20]</sup>。诚如普卢塔克的精彩评论所言，西塞罗使所有的罗马人领会到：“口才能给正当的事情增添多么大的魅力，正义只要正确地表达出来，就是坚不可摧的，一个高尚的政治家应当经常正当当地行动，而不是迎合奉承，应当说有益的话语而避免说恼人的词句。”<sup>[19](300)</sup>

如果说在希腊，修辞术所受到的来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批评还算建设性话，那么，到了罗马共和晚期，修辞术由于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一面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贡献，而另一面则受到了来自专制暴力的致命威胁。正如雅典民主制曾给修辞术的学习和传播提高良好的土壤一样，罗马共和制同样曾给修辞术展现魅力提供了充满自由阳光雨露的舞台；然而，随着共和制的衰亡，相伴而来的暴力和专制给修辞术带来的打击却是毁灭性的。在《论演说家》中，凭着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渊博的学识，西塞罗这位兼哲学家与政治家气质于一身的演说家就已洞察

到了罗马共和制的衰亡可能给修辞术和演说家带来的厄运。当时,最为流行的修辞术著作多是些关于演说规则的小册子,而西塞罗的《论演说家》则独取对话为写作方式,以演说家的修养和要求为主题来谋篇,并借罗马近期历史上若干的著名政治家之口道出有关演说技艺的种种真谛。这部著作吸取了希腊前辈哲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其后众多哲学流派与修辞术相关的思想,结合作家自己凭着雄辩口才和政治智慧积累起来的洞见,不仅奠定了在修辞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成为一部思想丰富、意义深远的政治哲学著作。借助若干罗马共和国历史上重要的演说家之口,这部对话体著作不仅完整地表达了修辞术的理论体系,而且暗含了作家对演说家与共和国命运共存亡的深刻洞悉。全书最寄寓深长的部分出现在了第三卷的开头部分,作家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歌颂了真正演说家的大义凛然的风范,同时也悲诉了优秀演说家们的悲惨下场。面对来自暴力的威胁,演说家克拉苏斯发出了宁死不屈的宣言:“……如果你想制服卢基乌斯·克拉苏斯,你不应该剥夺他的这些东西;你应该割掉他的舌头!不过即使你割掉了他的舌头,只要我仍然活着,我的自由精神仍会制止你的专横。”<sup>[10](503)</sup>而在其他几位惨遭暴力而倒下的演说家中,最为惊人的一幕留给了对话的另外一个主角安托尼乌斯,西塞罗用哀恸的笔触写道“在那座演讲台上,就是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曾经作为执政官,站在上面无比坚定地维护国家的那座演讲台,曾经作为监察官,用战利品装饰的那座讲台,却摆上了他的头颅,那颗曾经挽救过许多公民的生命的头颅。”<sup>[10](507)</sup>

当我们翻开普卢塔克的所写的《西塞罗传》,看到其中有关西塞罗之死的记述的时候,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位曾在自己著作中用笔记下其他演说家惊人厄运的作家,在面对专制暴力的时候,竟遭受了与自己笔下人物几乎同样悲惨的下场<sup>[20](328)</sup>。自此之后,古典修辞术走上了衰亡之路,而西塞罗留下的大量演说辞和对话著作,也就成了西方修辞传统中的天鹅之歌。

## 五

以上我们对西方修辞术从孕育、诞生、成长、鼎盛到衰亡的简要梳理,特别是介绍了修辞术在雅典民主制和罗马共和制下的处境和发展走向。虽然我们无法在一篇文章中面面俱到地涵盖有关修辞术与政治之间的所有关系,但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发,那就是,西方古典修辞术在本质上

首先是政治性的。要认识西方古典修辞术乃至整个西方修辞术,我们就必须将之与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结合起来考察,从根本上把握住西方修辞术独特的政治特质,只有这样才可能对这门西方古老的学问获得完整深刻的启示。这或许将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认识现代西方修辞学提供一个“坐标系”。

### 注释:

- ① “修辞术”与“修辞学”虽只是“术”与“学”一字之差,却可以很好地表达古今学问之间的巨大断裂。这一断裂源于启蒙运动后经验科学的理性主义给古代学术传统带来的严重冲击。做一个不算太严密的类比,修辞术到修辞学的演变,恰似星相术到天文学的演变,或者说古代医术到现代医学的演变。作为古代学问的修辞术与思辨哲学关系更近些,而且更加深入地扎根于政治土壤。现代学科化的修辞学虽然在系统性和逻辑性上更显进步,但却逐渐远离政治,而与语言学、文学等挨得更近。这也是本文选取西方古典修辞术作为考察对象来认识西方修辞术政治特性的缘由之一。
- ② 译文有改动。
- ③ λόγῳν τέχνη 英文常解释为“art of words, speed, or discourse”,意即言说的技艺,通常译为说话术。从《斐德若》的内容上看,柏拉图的苏格拉底除了批评作为一种言说技艺的修辞术外,似乎还正面推出了另外一种言说技艺——哲学的言说技艺,即辩证术(διαλεκτική)。而修辞术和辩证术作为言说技艺似乎都可以统领于 λόγῳν τέχνη 之下。笔者主张将 τὸ λόγῳν τέχνη 直译为“逻辑斯的技艺”,或称之为“言说术”。
- ④ α ντιλογική和 τέχνη διαλεκτική均包含有论辩的意思,后者特指“问答式论辩艺术”,在柏拉图著作中受到专门的使用,而前者则广泛用于普通的场合,包括法庭辩论。为了表示区别,笔者试着将前者译为“辩论术”,后者译为“辩证术”。
- ⑤ 柏拉图关于修辞术形成初期的描述,详情参见[11]。
- ⑥ 有关戏剧家和哲学家对智术师的批评,最好的材料是阿里斯托芬的《云》,中译本参见[15],以及柏拉图的《高尔吉亚》,中译本参见[7]。
- ⑦ 在柏拉图的笔下,控告苏格拉底的三人中,阿倪托斯(Α ντιτος)便是一个修辞家。详情参见[16]。
- ⑧ 引文略有修改。
- ⑨ 普卢塔克在给西塞罗立的传中说道,西塞罗成了“后三巨头”瓜分罗马政治权力的牺牲品,被安东尼派人杀害,双手和头颅被割下,放在了罗马广场演讲台顶上的船头上。详情参见[20]。

### 参考文献:

- [1] Sharon Crowley. Ancient Rhetorics for Contemporary Students [M]. New York: Macmillan College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 [2] George A. Kennedy. Classical Rhetoric and Its Christian and Secular Tradition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 [3] 尼采. 古修辞描述[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4] 亚里士多德. 修辞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5] Stanley E. Porter (ed.) Handbook of Classical Rhetoric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 (330 B.C.-A.D.400), Leiden: Brill, 1997.

- [6] Edward Schiappa. *Protagoras and Logos: a Study in Greek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3.
- [7] 柏拉图. 高尔吉亚[C]//柏拉图全集·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8] 柏拉图. 斐德若[M]. 柏拉图全集·第二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9]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5.
- [10] 西塞罗. 论演说家[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 [11] 罗念生. 罗念生全集·第五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12] George Kennedy. *The Art of Persuasion in Greec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3.
- [13] 柯费尔德. 智者运动[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6.
- [14] James J. Murphy, Richard A. Katula . *A Synoptic History of Classical Rhetoric*.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3.
- [15] 罗念生. 罗念生全集·第四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16] 柏拉图. 申辩[C]//柏拉图全集·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17] Sander L. Gilman, Carole Blair, David J.Parent. *Friedrich Nietzsche on Rhetoric and Languag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8] 撒路斯提乌斯. 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19] 皮埃尔·格里马尔. 西塞罗[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20] 罗念生. 罗念生全集·第六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The Political Particularity of Western Classical Rhetoric

LIN Zhixio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JiaYing University, Meizhou 514015, China)

**Abstract:** Rhetoric is a kind of the ancient knowledge in western history, and most important part of western cultural tradition. Whenever we talk about western rhetoric, we always like to compare it with the Chinese rhetoric. In fact, we would bring nothing but mistiness and confusion through any comparison unless we apprehend the particularities of western rhetoric. To truly apprehend the western rhetoric, we should get hold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rhetoric and politics, and appreciate the political particularity of western rhetoric.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sorts out the complex relation of sociopolitical condition and the classical rhetoric in 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and takes the political particularity as the essential of western classical rhetoric.

**Key Words:** rhetoric; western classical rhetoric; political particularity; the democracy of Athens; the Roman republican

[编辑: 颜关明]